

解码「大思政课」之「大」

周军虎 冯旺舟

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一字之差，是新时代新征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维革新与格局跃升。大思政课，“大”在视野，“大”在实践，“大”在效用。

“大思政课”何以为大

大视野指的是“大思政课”立足于新的时代呼唤，贯彻新的教育理念，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力图在理论探索上形成突破性创新。

我们要把“大思政课”置于国际国内形势转化的“两个一百年”大变革中进行思考与探索。当代青年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化特征。而思政课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使命，“大思政课”是全社会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将重大现实问题转化为鲜活的教学素材，帮助学生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牢牢把握其本质特征与事物的规律，锻造学生的战略思维与时代使命感。

遵循“三全育人”新的教育理念，构建全员参与、全程贯通和全方位覆盖的育人体系，将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各个环节，引导学生脚踏实地，将汗水洒在田间地头，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将目光聚焦于“国之大事”。鉴戒传统思政课的优势和弊端，在遵循教育规律基础上实现“大思政课”的突破与创新。形成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社会多维主体联动的育人格局。

在教学方式上，实现从单向输出到双主体和多主体对话的转变，变“我说你听”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双向互动，在和风细雨氛围中实现教育的目标和意图。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对学生成长全过程的融入。

“大思政课”如何做大

“大思政课”之大，不仅仅在于思政教育的大需求与教育理念的革新与规律的深度探索，更在于其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思政实践中得到滋养，在思政实践中得以生根发芽。主要体现在“大思政课”对思政教育范围和领域的拓展，对教育资源的体系化整合以及思政课评价体系的改革。

立足思政课主渠道建设，辐射课程思政的拓展，延伸思政课社会实践。学校思政课教学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要以久久为功的恒心和毅力推进教材体系的变革，大力推动思政课堂革命，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模拟、互动研讨等方式方法，增强课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课程思政是对思政课程的横向拓展，要充分利用各类专业课程尤其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思政元素，以思政课程建设牵引课程思政发展，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各地普遍建立的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就是要在先行先试基础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最后形成课程思政对非思政课程的全覆盖。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生动实践，以历史证现实，通过沉浸式教学，让学生实现与历史先进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超越时空的对话，自然生成并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本土企业、社区等单位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开展特色实践课程。邀请校外专家、模范担任校外德育导师，不为所有，但为所用，丰富教学资源。

“大思政课”如何放大效用

“大思政课”之大，还在于其在教育效果上突破传统思政课的局限性。从学生个人角度看，“大思政课”能够有效地塑造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通过系统的理论教育和丰富多样的沉浸式教学、海量的正反案例的剖析、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等方式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大学生的情感认同，有利于增强学生文化自信自觉。

从学校角度看，“大思政课”能够有效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提升育人质量。通过实施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教育实现深度融合。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资源、完善评价机制，实现思政教育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引领”的转变，显著提升了育人质量和水平。

从服务社会发展角度看，“大思政课”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是全方位的。首先是课堂教授时空的拓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以时代楷模故事塑造人品，以多元师资传递“真善美”的力量，实现课堂讲授与环境塑造，言传与身教的统一，回应社会对“培养什么人”的时代之问。

从国家层面看，“大思政课”以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己任，将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学生将小我升格为大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激励学生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跑出最好的成绩，在服务人民奉献国家中实现人生价值。

(作者分别为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城市工作重心要转向更注重“治理投入”

王德福

党中央时隔十年后再次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是新时代第二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会议强调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新华社播发的会议侧记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里强调的是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而不是其他投入。”总书记强调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重视治理投入，体现出对城市发展形势的深刻洞见与远见。

创新城市治理，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直接体现城市温度，事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必然要求。

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效能治理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主题。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转变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在新发展阶段，产业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吸引和留住人才需要打造有温度的城市环境，宜居与宜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对市民而言，高质量就业与高品质生活缺一不可，城市硬环境与软环境同等重要。城市间产业发展的良性竞争，既要注重产业政策、营商环境优化，更要重视生活品质提升。便利的通勤条件、丰富的休闲场所、安静的小区秩序，都需要高效能城市治理来保障。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是重要抓手。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大幅度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系统性提升，我国还成为世界上高层建筑最多的国家，9亿多市民在中国式小区里居住生活。进入存量提质增效阶段，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等老化问题逐步凸显，一方面要加快提高运维管护水平，另一方面要系统性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城市更新是对城市现有存量物理空间的优化改造，所有存量空间都附着有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与社会关系，更新行动必然涉及利益关系与社会关系调整，必须依靠高效能社会治理来保障。推进城市更新，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不仅考验着工程运营能力，更考验着社会治理水平。

现代化治理是现代化城市的必然要求。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超大特大城市更是巨型复杂系统，城市群和都市圈作为现代化城市体系的重要载体，更是对现代化城市治理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化城市具有空间规模巨大、组成要素多样、经济社会活动集聚度高、群体多元化流动性强等显著特点，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上看，超大特大城市甚至已经具备明显后工业社会特征，市域空间呈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压缩共存格局，风险社会挑战日益紧迫，这都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实现城市复杂系统安全有序运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发展保驾护航。

高效能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政府、社会、市民是城市发展的三大主体，也是城市治理的三大主体。实现城市高效能治理，需要统筹发挥政府、社会、市民积极性，实现协同共治。当前城市治理效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主要表现为三大主体作用发挥还面临一些挑战。

市民参与度还要提高。人民城市以人为本，城市治理也要实现以广大市民为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在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充分释放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发展史上资本逐利产生的社会排斥与社会分裂问题。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一段时期以来，政府大包大揽客观上制造甚至强化了市民参与意识不足的问题。这一阶段同样也是城市社会发育形成期，单位体制下的老市民需要从集体福利主义观念中转型，数以亿计的新市民需要适应城市生活方式，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广大市民参与能力的不足。参与不足主要体现在直接涉及市民生活品质的社区治理与文明城市建设中；中国式小区的物业管理和业主自治水平还不高，生活空间公共事务合作能力还有待提升，文明城市建设还需要市民更加重视城市公共空间的言行举止。9亿多中国人需要学会如何与陌生人做邻居，学会如何做好城市的主人。

社会融合度有待加强。城市是一个复杂社会系统，社会系统有序运转需要其构成部件、功能单元、社会群体相互融合。大规模增量扩张推动了城市社会的多样化、多元化和复杂化，但社会系统内部融合程度还不够。城市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也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活跃的社会，社会融合难度大。不同社会群体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差异大，社会互动中容易产生摩擦，大城市拥挤效应和后工业社会普遍性的社会焦虑会一座城市的社会融合水平。在这些基础上，党组织能够依托综合网格更加高效地开展组织建设、队伍管理、活动开展等各项党建工作。同时，党组织可以通过网络渠道实时了解新兴领域的动态和需求，从而提供精准服务，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政府协同性尚需优化。城市社会系统复杂性需要治理体系协同应对，城市治理体系既需要保持集中统一性，又需要具有灵

活适应性。作为城市治理体系的主体，政府组织的内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体系的协同性。一直以来，政府行政权力碎片化、条块不协调、层级权力不对称等问题成为制约城市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从早年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成立专门的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到近年来各大城市主动推动综合执法权向街道下沉，城市管理进社区、以及大力创新“吹哨报到”“民呼我应”“接诉即办”“高效办成一件事”“城市大脑”等体制机制，都在致力于破解上述顽疾，也取得积极效果，但同新形势下城市治理现代化需要相比仍然还有距离。

创新性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

人民城市呼唤人民治理。城市治理是一项包含公共服务、文化建设、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工程，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在党的领导下，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促进城市大融合，强化政府、社会、市民大协同，创新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城市治理共同体。

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优势。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党建引领城市治理效能，聚焦城市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与系统失灵的关键问题，靶向发力，搭建跨领域、跨系统共治平台，在党组织领导下推动各方有序参与、有效协作。要让亿万党员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规则维护者与社会组织者，发挥好催化社会合作的作用，在组织群众办理好身边社区小事的过程中实现服务群众与教育群众的有机融合，将分散的群众转化为有觉悟、有力量、有本领的人民。

要大力推动社会融合。随着城市发展转型，城市社会也从发育成长期向定型成熟期转变。要将社会融合理念贯穿到城市建设、城市更新以及文明城市创建、社会治理全过程，通过更具包容性的产业发展、更加充分的公共服务供给、更有温度的城市管理和更具开放性的社会治理，打造全龄友好的城市空间、自信大度的城市品质、尊崇礼仪的城市风气。

要不断完善城市治理机制。更加重视基层治理特别是社区治理，创新性践行“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将基层社区真正从过重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积极作为、久久为功，稳步提升广大市民直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责任意识和组织化水平。持续优化“12345”政务服务热线机制，坚持诉求回应与主动治理相统一，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深化。继续探索和优化政府体系责权利配置机制，务实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治理技术与治理资源，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协同化运行水平。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层治理从“网格化”走向“多格合一”

李阳 赵刚印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是城市基层治理统筹协调的重要抓手。近年来，随着城市治理环境的日趋复杂，网格化管理制度逐渐创新升级，“多格合一”（也称“多网合一”）应运而生。深入理解这一模式的内涵、价值和实践路径，对于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多格合一”是什么

“多格合一”是指基于空间地理单元，通过统一网格划分标准，将党建、综治、城管、警务、民政、环保、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各类职能网格整合为综合网格，旨在实现网格资源的灵活配置和治理主体的高效协同。

自2018年以来，中央多次发文推动“多格合一”，各地也因地制宜开展一系列探索实践。例如，武汉市以街道网格化系统为依托，全面整合基础网格、警务网格、综治网格等既有基层管理力量，推进人口、卫生、城管等数据在基层融合应用；深圳市罗湖区发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综合网格改革工作方案》，着力通过优化网格设置、畅通网格运行、配强网格力量、强化网格党建等举措开启新一轮基层治理综合网格改革；上海市出台《关于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多格合一”不断探索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新路的意见》，立足综合网格充分接近基层又具有整合性的优势，将其打造为城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实践单元。

作为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实践的一个重要动向和趋势，“多格合一”是对传统网格化管理模式暴露出的职能分工碎片化、资源配置不均衡、信息沟通不畅通等问题的回应与调适。在城市治理实践中，诸多职能部门都在基层划定并运作各自的网格系统。这些网格在同一地区可能存在一定的交叉或空白，一方面容易出现协调不足、重复执法、反应迟缓等问题，另一方面也给社区向不同职能部门反映问题和请求支持带来不便。

“多格合一”的提出，正是为了打破部门间割裂的网格管理，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治理框架，推动网格化管理从部门本位转向整体治理。通过“统一受理、分类处置、多元共治、闭环管理”等工作机制，大幅提升问题处置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此外，“多

格合一”更加强调治理关口前移。网格党组织通过发挥群众工作优势，常态化、全覆盖走访联系网格内的组织和个体，能够及时捕捉各类需求和问题，进而提前处置，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转变。

除了治理价值之外，“多格合一”还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供了有力抓手。相较于传统领域，以“两企三新”（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为主要构成的新兴领域具有分布零散、流动性强等特征，其党建工作容易出现覆盖盲区。而“多格合一”通过统一的网格划分，能够实现基层社会的无缝隙全覆盖，并确保每一个空间单元都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在此基础上，党组织能够依托综合网格更加高效地开展组织建设、队伍管理、活动开展等各项党建工作。同时，党组织可以通过网络渠道实时了解新兴领域的动态和需求，从而提供精准服务，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多格合一”如何行动

“多格合一”不是简单地对各职能网格进行物理合并，而是网格化管理体系的深层次重构，体现了“整体效应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性原理。网格边界的统一只是“多格合一”的表征，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治理资源、治理力量和业务流程的融合。从各地实践来看，“多格合一”主要包含以下行动实践。

一是党建引领。党的领导为“多格合一”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效弥补了传统网格化管理模式以行政逻辑为主导所存在的不足。首先，街道（乡镇）党政班子成员担任网格长，统筹协调和推动相关工作的落实，避免治理过程中出现管理断层和协同障碍的情况。其次，以网格为单元，建立实体性的网格、片区或街区党组织，定期召开网格党建联席会议，搭建常态化的信息沟通和协商议事平台。再次，通过将党群服务阵地与综合网格的工作阵地、服务站点相融合，使其成为资源协调、矛盾调解和服务供给的综合载体。

二是治理尺度重构。统一性是“多格合一”的核心特征。通过统一网格划分、统一人员配置、统一管理标准，打破了部门之

间的壁垒，形成了协调一致的治理体系和全覆盖的治理单元。在现代城市中，需求的多样性和治理的复杂性要求对城市治理单元进行合理划分和有效衔接。“多格合一”通过重构基层治理尺度，形成了更加灵活和扁平的治理结构。例如，上海市在“多格合一”的专门性文件中，明确指出发挥综合网格这一治理单元既无限接近基层又兼具整合可能的独特优势，从而有效解决街镇治理幅度较大、难以精细，居村层面工作拓展面不够、资源相对匮乏等问题。

三是跨部门和多主体协同。“多格合一”通过构建“一格多能”治理架构，实现“一个网格管到底”，有效推动了“三跨”（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问题的解决。且对于居委会等治理主体而言，“多格合一”可以显著减轻其治理负担，使其无需再将大量时间消耗在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上，转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联系服务群众的核心工作中。此外，作为一个规模适当、主体多元、机制灵活的非行政化治理单元，综合网格能够为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志愿者和居民等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提供制度化平台，进而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

四是数字平台支撑。依托“一网统管”等城市运行管理数字化平台，“多格合一”能够实现各类信息的统一采集与实时分析。网格内的治理问题、居民诉求、环境变化、安全隐患等各类信息通过自动采集和人工上报，及时传递至相关职能部门，确保各项问题得到快速处理。此外，通过数据分析和案例比对，网格党组织和职能部门能够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同时，平台化的管理模式也为信息共享提供了条件，有效打破了部门之间的壁垒，避免了信息孤岛的现象。

总体而言，“多格合一”并非网格化管理体系的颠覆性改革，而是对城市治理的创新调适。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持续推进、螺旋上升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多格合一”等城市治理创新只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保持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才能始终展现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实效性，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博士后，上海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教授)

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吗？

陶鑫杰 万鸿雁

或者说，人工智能距离真正的“智能”还有相当距离。

当前这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多数仍停留在对人类智能行为的模拟、拓展和延伸，其核心目标旨在通过算法设计、程序推演和数据驱动获得类似于人的推理、决策和实践等能力，从而协助和满足人类完成某些领域的既定工作和预期目标。无论是基于内容推荐的个性化机器程序，还是基于算法推荐的大众化计算模型，它们的设计无疑都是源自人类对问题求解模式的数字化抽象和技术化表达。

这就好比工具可以拓宽视野，但无法代替眼睛；机器可以为人类生活解答难题，但无法给予真人一般的贴心陪伴；算法可以剖析数据，但无法明晰意义。虽然这些以程序设计和算法驱动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在大数据的处理上拥有海量的吞吐能力和计算手段，能够在短时间内给出自身答案，但是机器目前仍然是机器，它们所计算的每一节、运行的每一环、迈出的每一步，还是对原有设计者预期意图的彰显和反映，自始至终还没有具备类似于人类般的自主意识和情感温度。

学界有观点认为，人的左脑主要从事判断、推理、分析、书写等逻辑思维，而右脑则主要从事情感、顿悟、直觉、记忆等形象思维。人工智能的设计与运行只是模仿人的左脑功能，而右脑所赋予的功能则无法实现。如唐朝诗人杜甫所创作的千古绝唱“感时花溅

泪，恨别鸟惊心”，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便犹如隔世之音，可能无法理解和体悟该诗创作时，内心所涌动的悲凉与哀伤之情。

当然，人工智能虽然无法拥有类似于人的情感和创造功能，但是其迅猛发展也会对人类就业造成冲击。短期内人们或许难以接受，但是放眼历史长河，这种冲击将会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加速器”。因为人工智能在取代某些岗位的同时，会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就业机会和行业产值。正如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样，拥有内燃机的汽车在取代马车的同时，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围绕汽车生产、销售全流程的新的岗位和职业。因此，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们的“饭碗”不会丢失，而是转变成新的工作形式。

总之，当下的我们不必对“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给予过度担心和焦虑。因为人类所拥有的创造力、想象力、共情力和判断力，仍是人工智能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今后，我们要不断领悟人类智慧的思想伟力与创造才能，不断推动人工智能的研发投入和迭代升级，不断促进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优势互补与深度协同，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服务社会、增进福祉的最终目标，从而将人类导向更加发达精妙的智能文明。

(作者分别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阜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不久前，一款人工智能系统，通过使用自然语言以35分的高分(满分42分)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消息引发热议。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成为人们的主人？是否会争夺人们的“饭碗”，抢占人们的工作、威胁人们的生活？

不可否认，当前发展尤为迅速的人工智能，相较于人类智慧来说，确实在科学研究、金融投资、医疗诊断等领域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优势。比如，由中国科学院设计研发的磐石·基础大模型，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数千篇的文献整理与调研工作，其中包含各种复杂图表与表格，极大缩短了科研时间，提高了科研效率。再比如，由“蚂蚁数科”正式发布的金融推理大模型，能够根据市场整体行情生成风险评估报告，从而辅助企业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由“海豚智声”研发打造的超声多模态大模型，因为依托于高效的算法支撑，所以能够有效地摆脱传统超声依赖于医生经验与手法的诊断局限，从而提升了诊断效率与质量，推动了超声技术向基层领域的下沉。

但是，人工智能上述优势还不足以构成对人类的“致命威胁”，